



太阳山上复原的武夷干校旧址

抗战时期党在武夷山创办的干部学校

□ 苏宝铭 李雨西

建省委驻地崇安开办。自第三期开始,福建省委将训练班改名为福建省委武夷干校,由省委书记曾镜冰担任校长。武夷干校在崇安共举办四期,第五期随省委迁至建阳举办。受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影响,各期班次学习时间长短不一,比较灵活。

武夷干校开设的理论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发展史等,教材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政策讲解主要依据党中央各项文件,对国际、国内和省内外形势进行介绍,总结出适合福建开展斗争的经验。在党性教育方面则注重培养学员的斗争精神、理想信念和革命气节。福建省委创办的理论刊物《锻炼》和干校墙报《学习》,为学员提供了学习材料。

武夷干校坚持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开展教学。比如第一期以省委机关的干部为主,学员水平较高,主要课程由曾镜冰主讲抗战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留苏归来的顾惠生讲授马列主义哲学原理。第三期以福州和赣东北干部为主,学员多是基层党员骨干和青年学生,便将学习重点放在提高干部执行中央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上。

1942年底,日军放弃对浙赣铁路线的控制,国民党顽军对省委驻地闽北地区的第二次军事围攻结束,暂时无力组织新的围攻。此时福建省委已在闽北转战两年,暂时稳定在建阳太阳山,为开展整风学习、加强党性锻炼和总结斗争经验,决定开办武夷干校第五期训练班,学员100多人。参训学员除了一些前来省委参加第一阶段整风学习的干部外,还抽调了本地区的部分工农干部和来自城市从事秘密工作的知识分子。省委考虑到保密和地下斗争的需要,规定从城市来的干部需用编号代替姓名,且不能互通情况。

为给学员们提供稳定的学习环境,福建省委带领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员在太阳山上搭建了可供居住的竹棚,并建立了会场、操场、墙报栏等配套设施。武夷干校非常重视教学实践活动,除了日常上课学习,还组织学员开展军事训练,常常夜间紧急集合;经常举行文艺晚会,通过演活报剧、唱歌、跳舞等丰富的活动阐明革命道理、促进干部团结。当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学员们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教材缺乏,大家就争相传阅、抄写,一张纸写了正面写反面,写了铅笔写毛笔。大家团结一致,精神饱满,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

武夷干校的创办提高了参训干部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斗志,进一步凝聚了福建省内的革命力量。学员结业后,部分留任省委工作,部分返回原岗位继续战斗。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对敌斗争,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如曾镜冰在创作的歌曲《武夷颂》中写道:“武夷山上,生长着一群抗日的健将,他们驰骋在扬子江畔。武夷山上,今天是青年学习的场合,明天是他们作战的战场。听啊!歌声嘹亮,看啊!百花飞溅。”1943年9月,福建省委迁入闽中,后续开办的训练班不再沿用“武夷干校”的名称。

红色文化薪火相传。时至今日,武夷干校作为红色资源的价值愈发凸显并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其遗址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当地通过建立陈列馆、复原教学场景、制作红色宣传片等多种形式,深切纪念这段光辉历史。如今,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群众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武夷干校遗址参观学习,追寻前辈的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抗战时期,中共福建省委在闽北崇安(今武夷山市)禄村洋和建阳(今南平市)太阳山先后举办了五期训练班,即武夷干校。这所干部学校担负着理论教育、统一思想、增强党性的重要任务,共有300余名干部在此接受党的教育,成长为抗日骨干和先锋力量。武夷干校的学习培训,对提高福建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增强福建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夺取抗日反顽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原中共闽浙赣特委和闽东特委合并成立中共福建省委,主要领导闽北、闽东、闽中等地区的工作。此时,省内一批党员干部已随新四军离闽北上,福建省委成立后为解决干部数量不足的问题,大力发展党员,闽北各县党员总数一年内便发展到3000名,其中新发展的党员占大多数,他们虽然有着高度的革命性,但仍存在着党性不足的问题,政治素质急需提高。1939年7月,为训练大量革命干部以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福建省委决定创办马列主义训练班,对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老干部进行训练。

1939年9月,第一期训练班在福

贺兰山下的诗意传奇

□ 潘建红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800多年前岳飞挥毫写下《满江红》这篇磅礴诗章,以金戈铁马的意象将贺兰山刻印在世人记忆。循着广袤的中国西北大地,贺兰山犹如一道雄浑伟岸的脊梁横亘于宁夏平原之西,既切割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地理边界,又串联起千年历史的烽火与烟霞,最终将岁月淬炼为沉潜于山岳褶皱里的诗意传奇。

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韦骢以其传颂千古的诗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为我们勾勒出了宁夏的富饶美景以及作为边塞重地的独特风貌。遥想当年,宁夏这片土地在世人眼中是怎样的一片神奇之地。诗中所要送别的主人公——出任灵武节度使的尚书卢潘,是一位颇具才华和建树的大唐名臣。韦骢的这首《送卢潘尚书之灵武》使宁夏美名远扬,也使卢潘在唐诗的流传中为后世所熟知。身为土生土长的宁夏灵武人,我

每读此诗,思绪便似穿越时空与诗人同行,在贺兰山脚下沉醉于塞上江南的灵秀和壮阔中。贺兰浩然,岁月悠长,那些闪亮的历史荣光终将留下永恒的印记。

时光流转,唐后又过了五六百年。明代的安塞王朱秩炅,同他的父亲庆靖王,都曾长年在宁夏戍边生活,对这片土地怀有深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动人心弦的诗篇。一日,朱秩炅游历至贺兰山下,挥笔写下了《古冢谣》:“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今天,贺兰山下的苍茫巨冢西夏陵在历经近千年风雨后仍巍然屹立,为延续近200年历史的西夏王朝提供了实物见证,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生动见证。

穿过历史的天空,仰望那静静矗立的贺兰山,这座被宁夏儿女亲切唤作“父亲山”的雄伟山脉,仿若一位坚毅的守护者,以钢铁般的脊梁铸就

一道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为这片土地抵挡寒风和沙尘,庇佑着万千生灵。在西北乃至全国的生态版图上,它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由于过度的开发与破坏,贺兰山满目疮痍、伤痕累累,自然资源和环境濒临危机,保护“父亲山”迫在眉睫。这种情况在近年来有了根本改变。一场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环境保护之战悄然拉开帷幕,特别是2017年,宁夏正式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战。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贺兰山已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机。青山常在、命脉永续,贺兰山的壮美画卷永不褪色。

俯瞰贺兰山东麓,一片片葡萄园如绿色的宝石镶嵌在大地上,“果园城”的蓬勃盛景尽收眼底。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这里成为世界公认的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的黄金地带之一。周末,我常常带着孩子穿梭于沙砾土壤孕育的葱郁葡萄园中,感受这片土地的慷慨馈赠。贺兰山东麓

的葡萄酒,也让世界认识了宁夏这片神奇的土地。

随着贺兰山生态环境的改善,乡村旅游也在这片土地上热了起来。假日和家人漫步贺兰山下的古村落,绿树掩映、水流环绕,淳朴的民风、美味的清炖羊肉、络绎不绝的游客,绘就了一幅“水木万家”和谐共生的新图景,铺展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锦绣卷轴。

站在贺兰山下,遥望那如万马奔腾的连绵山峰,心中感慨万千。这片山脉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变迁,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与憧憬。文化传承、民族融合,家园美丽、百姓幸福,千百年来的祈愿恰似一颗种子,在贺兰山下落地生根,生生不息,日渐绽放出繁荣昌盛之花。



唐代进士及第有多难

□ 段培华



科举考试在隋代时出现,到了唐代有了一定的发展。唐代科举主要分为明经科、进士科等,其中进士科更受唐人推崇。在唐代,进士及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唐代录取进士非常少。唐代进士科每年开考一次,289年中,总共开考273次,录取进士6692人,平均每年只录取20多人。由于录取人数太少,考中进士当时被比喻为升仙,进士被称为仙才,进士榜被称为仙榜。如刘商《姑苏怀古送秀才下第归江南》写道:莫便五湖为隐沦,年年三十升仙人;韦庄《放榜日作》写道:一声天鼓辟金扉,三十仙材上翠微;黄滔《放榜日》写道:吾唐取士最堪夸,仙榜标名出曙霞。进士及第非常难也非常荣耀,唐代宰相薛元超曾感

叹平生有三大遗憾,其中之一即没能进士及第。

因为录取人数太少,进士落第是常态。唐朝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像李白这样商人出身的文人连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即便李白有考试资格,也未必能轻易考中。与李白齐名的诗圣杜甫,唐玄宗时曾参加科举考试,也未及第。杜甫并非个例,孟浩然也终身未中进士。中晚唐的李山甫,诗才出众,唐人司空图称他“谁似天才李山甫,牡丹属思亦纵横”,可是,无论李山甫如何努力,始终中不了进士。又比如唐末诗人罗隐,建立吴越国的钱镠曾高度评价他“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遗憾的是,罗隐从公元859年开始,花了20年也没中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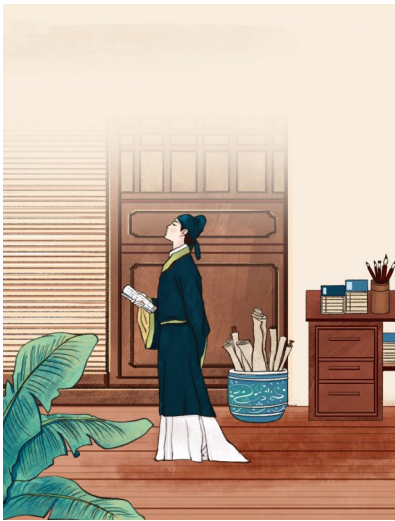
考中进士也不年轻了。唐代谚语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在唐代,如果一个人30岁考上明经科,算年纪大的;50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诗人刘虚白多次落第后写了一首《献主文》:“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待至公。”也就是说,刘虚白已经在科举上耗费了20年

时光。幸运的是,这一年他进士及第。温庭筠的儿子温宪在《题崇庆寺壁》中写道:“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温宪直到头发花白、年近五十才中进士,且考中进士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又如诗人孟郊,46岁才中进士。晚唐诗人韦庄,更是直到59岁才中进士。当时考中进士的人年龄普遍很大,唐代科举曾出现著名的“五老榜”。唐昭宗光化四年(901年)录取的进士中有五位分别为54岁、59岁、64岁、70岁、73岁,远远高出了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令人唏嘘。

唐代科举也有举荐的路径。南宋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记载:“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考试不糊名,阅卷时就可能失之偏颇。通榜是考试前考官根据考生的社会声望和才德评价制成的名单,供录取时参考。由于实行通榜,很多考生就得在考试之前将自己的作品送给达官显贵,以增加录取机会。如晚唐诗人朱庆馀作《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

时无”,以期得到张籍的赏识。孟浩然、杜甫等都写过这类诗歌。应该说,“通榜制”客观上也选拔了不少人才。如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经三战三败,第四次由梁肃向主考官陆贽保荐才得以及第。诗人李商隐,科举之路坎坷,后来得令狐绹的推荐才金榜题名。只是,与高门大户子弟相比,难免有不少出身孤寒的知识分子空怀济世之志,始终无法进士及第。

虽然唐代科举对于选拔人才有缺陷,但它为寒门士人开了一扇门,已经比魏晋南北朝时的察举制进步了很多。而且,科举也不是当时唯一的出路,唐代落第士人可以当幕僚,也可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只是,执着于进士及第的士人,难免要饱尝一番辛酸了。



糍粑焦香里的乡愁密码

□ 胡光贤

说:“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四嬢(嬢)做糍粑时,总让我们去割稻茬?”这句话像石块投入了平静的水面,记忆的涟漪便层层荡开。

故乡的糍粑总在腊月登场。母亲提前三日泡好糯米,乳白的米粒在陶盆里涨成“胖娃娃”,捞起时还滴滴答答地落着水。捞起的糯米需要放入木甑子蒸熟。木甑子是父亲亲手打的,蒸糯米时要搁在三尺高的土灶上,我蹲在灶前添稻茬,看金黄的火焰舔着铁锅,水汽从甑盖边缘溢出,很是有趣。“火要匀,跟人做事一样,不能忽冷忽热”,父亲在旁边叮嘱。

蒸好的糯米,冷却后放入石臼。石臼是祖父从山上凿来的,木杵砸下石,石臼槽里的糯米“扑哧”一声绽开,細膩的糯米粉渐渐黏在杵尖上。我和妹妹趴在石臼边数着次数,五下、十下、二十下,直到父亲的额头沁出细汗,母亲才会从杵尖掀下一团熟糍粑,蘸着白糖塞给我们。太美

味了,我和妹妹烫得直哈气却舍不得松口。

那时的糍粑是藏在木柜里的珍宝。母亲把做好的糍粑铺在竹筛上,等水汽收干便码进陶瓮,盖上千干净的蓝布。除夕守岁时,父亲用火钳夹着糍粑埋进炭火,不一会儿糍粑就鼓起金黄的泡,米香四溢,取一块蘸点蜂蜜吃下去能甜透整个寒夜。

古镇的石板在暮色中渐渐冷却,店主开始收拾摊位,石板上的油渍在灯笼的光照下泛着温润的光。“现在年轻人都用机器打糍粑了”,她擦着石板说道,“可这石板的火气、木杵的劲道,机器可做不出来”。她的话让我想起去年在超市买的糍粑,吃起来确实味道相差很远。

回到堂哥家,看着书桌上我们新买的糍粑,忽然想起故乡的石臼早已裂了缝,被父亲改作种花的盆,木杵靠在墙角也生了霉。但母亲说起糍粑时,眼里依然闪着光:“等你回来,家里有新糯米,就用后院那口老灶,

还能做。”

临睡前翻出手机里的老照片,10岁的我蹲在烟熏火燎的土灶前,鼻尖沾着柴火灰,手里举着刚出锅的糍粑。照片有些模糊,但我却清晰记得那天的阳光穿过木格窗,在糍粑上投下菱形的光斑,像极了烤糍粑时那跳动的火焰。原来,有些味道早已刻进骨髓,当石板糍粑的焦香漫上舌尖时,那些关于土灶、稻茬、木杵的记忆,便全都鲜活起来。

是的,这糍粑就是藏在我味蕾深处的密码,轻轻一触,便能打开记忆的闸门,让那些关于年节、亲情和土地的故事,在时光的长河里,泛起温暖的涟漪。

